

WENYI BAO

2010年11月22日 星期一 第16期

本期专刊由中国作家网协办

六月的最后一天,妹妹的公公离世,隔一天,我们赶到朝阳医院为他老人家送行。送别是在一间很小的太平间进行的,在场的主要是亲属。没有哀乐,播放的是老人生前特别爱听的德德玛的草原歌曲。没有悼词,只是妹夫讲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他讲到父亲平凡人生的不平凡经历:14岁参加抗日,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延安学习过,曾作为中共与谈代表团的机要人员赴重庆、南京,在周恩来、董必武身边工作,家里还保留着在南京时的户口簿,照片和姓名下有两栏:家庭地址是梅园新村30号,户主是周恩来。妹夫还讲到父亲在世时家庭生活里令人难忘的小事,以及他们父子之间平时很少表露的内心情感。音乐、追忆和哭泣,形成家庭告别的特殊气氛,与我们平时参加的追悼会不同,在痛苦悲戚中,你能感觉到中国人所说的“家”的含义,那是一种岁月积累起来的割不断的牵连和在风风雨雨中永远都不会消退的温暖。

妹妹的公公是老革命,不知经历了多少腥风血雨的斗争和生死离别的场景,在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不想张扬自己的过去,选择了“不给大家添麻烦”的方式,静静地消失。无须“盖棺论定”,不必费心斟酌和讨论评价的高低,更没必要兴师动众、惊扰四邻。他没有什么重要遗产,留给后人最有价值的是关于他的记忆,是他用他的历史书写的他的人格。应该说,一个自然而然、

## 越来越远的是我们自己

□杨献平

“一个人的死亡像一个强大民族的衰落”(米沃什《衰落》),这是一种境界,我们很多诗人做不到——几乎每隔几天,我会读诗歌,但大都是西方和中国古代的。当代中国不少诗歌阅读时找不到惊奇的句子和巨大的温暖力量,也找不到那种被清水洗涤和青草围拥的快乐。

诗歌在我生命里的比重是显而易见的,从阅读到自己练习,再到只阅读不写作,这个过程似乎一个轮回。阅读使得自己萌发写作的欲望,而写作之后又备感失望。诗歌对天赋的要求是绝对的,不是梦想在文字当中的“闪现”,而是语言之花在灵魂中酝酿、开放和败落的生动影像。

写作还是要有地域依托的。关于这一点,有人反对,说,中国目前的乡村城市化进程已经在改变旧有的故乡和故土、文明及习性,乡村写作将来会越来越没有出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进程,是为期不远的世界大同和文明同化。关于此,我开始听得津津有味,后来越听越不对劲。其一,城市化进程并不像学院派及新左派说的那样急速和迅猛,中国要实现整体上的城市化尚需时日。其二,即使城市化如期实现,传统意义上的乡土逐渐被覆盖,成为消失的记忆。这对乡土题材的写作更为有利,甚至更为迫切。当消失成为必然,挽救与保存这个时代的变迁及消失过程,将这种遗产真实无缺地书写并保存下来,一旦被全球化全面占领,消失和被取代的即是传奇,即是文明之根,即是后人的梦想。

文学的另一个主要功能,是为消失的作传,为乌有的建造纪念碑。

俄罗斯诗人勃洛克在《致缪斯》一诗中说:“人们在用各种方式谈论你/对于某些人,你是缪斯和奇迹/对于我,你是痛苦和地狱。”在奇迹和痛苦之间不一定有必然联系,而缪斯肯定不会排斥地狱——作为题材的一种,其方式、理想和诉求都不过是一种过程和“姿态”而已。

由此,我觉得,对无望之事的奢求是徒劳的,对既有事实进行否定也是徒劳的。不受蛊惑,反抗及“不从”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信仰。或者说,任何一种方式都会抵达,任何存在即梦想都应当纳入我们的心灵甚至信仰范畴。

矫枉过正是一种伤害,在高瞻之下,明察并认定自己的道路,甚至比某些事情的本质更重要,更有价值。

几年前提出的“把文学活动与现实生存分开”的观点,至今觉得有一定道理。肉体的速朽性决定了生命的长度,而文学活动则是代代传承和接续的事业,它曲折,无终止,它可成经典,更多的却被淹没。尤其在这个“浮躁”、“同谋”、“指鹿为马”、“利益和肉欲至上”的年代,一切都在花样翻新,一切都出人意料,一切又不足为怪。因而,“坚持自己的”和“将现实与文学区隔开来”是有必要的。

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远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我们所要的那些。生命及某些事件的“场域”可以时过境迁,可是惟有“仁爱”不会破损,“宽容”不会过时。从目击父亲被埋在土下的那一刻,我就明显觉得了一种来自内心的安静和肃穆。我发现我不再是以前的自己,换了一个人一样,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作文,都觉得自己走了很长一段弯路。主要体现在,总是被子虚乌有的东西蒙蔽和拖累,被某些“似是而非”的“意见”、“批评”左右思想,从而改变自己的行动,也总是在梦想现实利益的最大化,用来给更多的亲人解围解困。

有时候也想,我和不断远去的“自己”及其一切附着物,都是有联系的,尽管这个联系渺茫、无足轻重。当我老了,我会把我们——一串联、组装起来,并在扉页上抄上茨维塔耶娃的诗:“任何人无论用什么/也不能把我们分开/我亲吻过你,穿过/几百里相隔的路途”(《致曼德爾施塔姆》)。

## 乡村的剃头师傅

□牛庆国

头在人的身体上,被看成是最贵重的部分,因此,头是不能轻易被摸的,即使两个人再亲热,也不能摸对方的头,尤其是女人不能摸男人的头,孩子不能摸大人的头,否则就被看成是大不敬,这样看来,一个的头就是一个人的庙宇。因为头的尊贵,剃头就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一件庄重的事。在我的记忆中,剃头时剃下的头发是不能踩在脚下人的,也是不能随便扔到什么地方被喜鹊之类的鸟儿衔了去筑了巢的,必须将头发收拾起来,包好塞到墙缝里,或者门窗上的棉花眼里。因此,每当我们剃头时,母亲就站在旁边,拿了笤帚一点一点地扫着头发,扫得小心翼翼,生怕漏掉一丝头发屑,更怕一不小心踩了头发,仿佛那头发是长在地上的禾苗,一脚下去会把它们踩死。

小时候,我们弟兄们的头一般是母亲剃的。母亲细心地磨了剃头刀,温了热水把我们的头发洗湿,再把自己的围裙围在我们的脖子下就开始给我们剃头了。但母亲的手艺的确不怎么好,因此,常常把我们剃得鬼哭狼嚎。我们越哭,母亲就越紧张,因此,母亲手下一颤,就会把我们的头皮剃烂,这时母亲就停下手来,拿一点头发屑贴在剃烂的头皮上,轻轻地吹一吹,然后,一边哄着我们说,不疼,不疼,很快就好了,一边再剃。要是我们实在哭着不让母亲剃了,母亲就用剪刀给我们剪,虽然剪刀不会疼,但剪过的头皮上,头发总是长得不均匀,一道白一道黑,像春天剪过毛的山羊,好在那时有这种“山羊”头的孩子多,也就没有谁笑话谁了。

记得母亲有一次给父亲剃头,那简直是诚惶诚恐,剃头前母亲先洗了手,然后只用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轻轻地按着父亲的头,右手拿着剃头刀一点一点地剃,由于她的格外小心,却偏偏把父亲剃得呲牙咧嘴。

本来,母亲是不给父亲剃头的,父亲的头一般都是请岔里上了年纪的老剃头师傅剃的。那老师傅姓杨,岔里老老少少都叫他老杨。岔里谁的头发长了,就去请老杨,老杨便在兜里装上剃头

## 离去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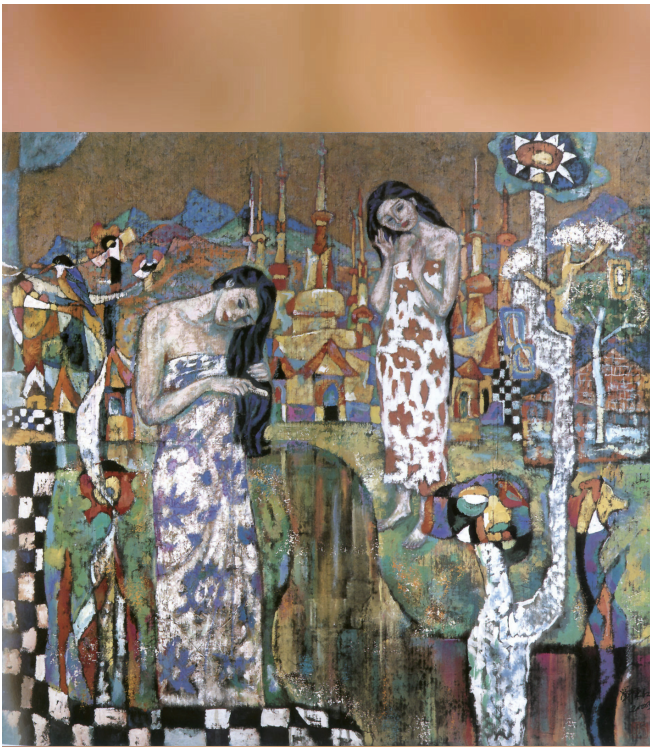
□秦晋

悄然而去的人,一个付出极大而索取极少的人,一个一生乃至死后都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平静和安详让人肃然起敬。

由此我想起前年过世的我一个表姐。她比我大十多岁,夜间突发心脏病,抢救不及去世。等我们知道的时候,后事已经办完了。今年清明,我和三弟去她的墓前祭拜,花岗石的墓碑上,刻着表姐和在“文革”中死去的她的大儿子的名字,墓碑背后是表姐手书体的三个字:“再见了”。据说这是她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表姐一生也有很多故事。其父是黄埔一期学生、我党在杨虎城军中的高级将领,后为我军一野参谋长。表姐小时候随父母在国统区西安,抗战后回到延安,她先在女大学习,后到中央保安处工作,她的丈夫是朱德总司令的机要秘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两家都住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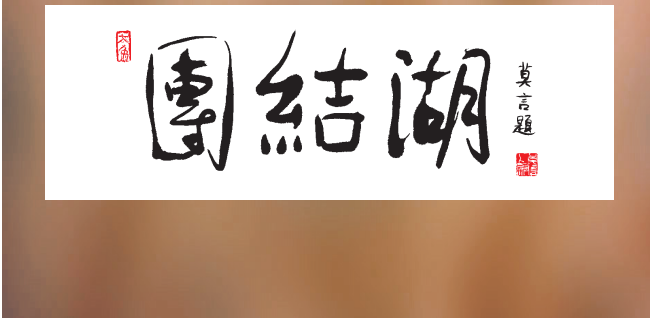
北京的西四附近,母亲常带我们去舅舅家。在我印象中,那时的表姐人长得漂亮、思维敏捷、口齿伶俐,在家中子女里她是最有权威的。她的突然离去,让所有亲人备感伤痛。她的家人没有把此事立即告诉我们,很可能是怕我年事已高的母亲受不了这个打击。那天从墓地回来,我脑子里一直闪着那三个字——“再见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表姐用一句最简单最普通的话,把死别的恐怖和痛苦淡化了。她不希望给亲人留下无法忍受的悲恸,而宁愿把诀别当做是一个短暂的分离;她不愿意追求热闹排场和等级待遇,而宁愿陪着自己的儿子在一个偏远宁静的地方安息。表姐的脱俗超凡之处,在于她的不平凡身世与平凡心态的真正统一,一直到她人生的终点。

当代著名思想家弗洛姆说:“人在一个确定的地方,一个确定的时间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必将以同样的偶然的形式离开这个世界,人在认识自然的同时,会懂得自身存在的软弱与局限,会预见到死亡这个最终的结局。”因此,用什么方式结局,是人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身的一部分,是人的生存观念和生存方式的最后表现。他是怎样活着的,他将怎样离去。存在主义作家加缪说:“我不愿相信死亡能通向另一个生命。对我来说,那是一扇关闭的门。”而我想说的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尽量把那扇退场的门关闭得漂亮一点。



瑞丽江畔(粉彩)

刘秉江 作



湖团结

莫吉志

## “匍匐”生存

□刘照进

2004年冬天,我将散文《匍匐》投到某省级文学刊物,不久后我打电话给编辑部了解稿子的处理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可以引用,但要修改。编辑老师建议我将题目换掉,而且内容也要改得明亮一些,说我原先的稿子过于灰暗,并且暗示我生活中不乏亮点。这让我陷入两难。一方面,我固然希望能够发稿(甚至是渴望),另一方面,我又不想单纯因为发稿而改变我写作的初衷。有关《匍匐》一文,我只是将我秃笔插入到生活的底层,在那里挖出了真实的煤矿。它原本就是灰褐色的,带着灰暗的色彩,无法给人以拔高的启迪和照亮的信心。但我相信它的真实能够带给人强烈的震撼,远比那些号子似的歌咏有力量。这不得不让人警惕:文学的“样板化”依旧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不明白,难道文学除了在向艺术的高峰靠拢之外,面对苦难它还需要绕道而行吗?或者对现实进行巧妙的伪装甚至改头换面?在世俗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更多人心里的文学概念是什么呢?难道是涂着政治口红的浅俗图解吗?

权衡再三,我最终抵制了发表的诱惑。好在稿子终于被其他杂志利用,这多少是对我固执坚守的一种安慰和鼓励。

事实上,我一直喜欢“匍匐”这个词。我喜欢它卑微、卑小、卑怯甚至卑琐的气质,它所包容的民间的隐忍和沉默。直至今天,它内心的渴望和疼痛依旧被简拙的外衣包裹。这是贴近大地较为真实的行走,它们的存在似乎天生就被人忽略。很多时候,匍匐,它已在我心中结出泪水的藤蔓,我的怀旧和感恩通过时光隧道回到劳动的田野。就像粮食家族中的玉米、红薯、土豆这些低矮植物一样,尽管它们一直以灰

在沙漠里,除了沙子还是沙子,顶多还有一轮烈日抑或满天星斗,统治着它的白昼和夜晚。

按道理说,越是荒无人烟的空地,越容易出现神迹。可这是一个连神都无法居住的地方。所以沙漠里没有古老的神话,也没有浪漫的传奇,没有音乐、诗篇、祈祷或祝福,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具昏迷的躯体以及失神的天空。惟一在进行、在延续的,是沙子的无性繁殖。沙子也在努力变化,可它只能变成沙子,变成更多的沙子、更小的沙子,直至像粉末一样琐碎。沙子是这块土地永远的遗孀。我在很远就闻到了一股哀悼的气息。还有什么事物,能够如此坚贞地为已逝的繁荣与富饶守灵?

我首先怀疑:是否误入了神所遗弃的废墟?贪婪的神啊,曾经在此开采金矿。毛乌素昏黄的天空,是一副粗糙的筛子,在风的配合下,筛呀筛呀,洒落的是无穷无尽的沙粒。那被隔绝的黄金,却不知去向了。神掠走了精华,只给我们留下成堆成堆的渣滓。直至某一天,饱受压榨的土地失去了最后的利用价值,神也无情地离开了。这荒废的露天作坊,记载着一个已泯灭了淘金梦。

一位热爱黄金的神走了,另一位热爱艺术的神又来了。正是风,构成了沙漠惟一的生命力,哪怕是一种虚拟的生命迹象。我感觉,沙漠在缓慢地移动,在匍匐前行,并且刻意模仿波涛的形状。哦,丘陵起伏,这是沙漠在以想象止渴。我想起一位云南的流浪诗人写过一句好诗:“每一粒沙子都是一滴渴死的水。”他的心已比因焦渴而四处追寻的沙子流浪得更远。或者说,他在写诗时已属于沙漠的一分子了。沙漠离海很远,但沙漠仍顽强地向海靠近,几乎是凭一种本能。应该理解它推进的速度,应该理解它对波浪的羡慕与抄袭:只需要一滴水,就能够供全体分享,否则就会渴死在途中。只需要一滴,不管是被巧手发掘的井水、神赐的雨水抑或在日夜煎熬中苦心经营的露水,就能够使它欲仙欲死,使它死而复活。为了这一滴,它愿意等待一千年。假如沙漠有什么信仰的话,它只信仰水神,并且带着宗教一样的狂热。因为所有的信仰莫过于此:都是为了弥补自身的缺陷。

我不也是一样吗?我也不患有同样的相思病吗?以写诗的方式,给自己的诗歌止渴。空白的稿纸就是一片渴望的沙漠。或者说得更彻底点,作为一个皈依于美的诗人,我本身就是一座时刻呼唤着灵感沙漠。诗意是从天而降的雨水。为了更快地接近它,我在梦中也弓起了腰背,我理解了沙漠的乞求与迎接,以及它在月光下扭曲的体形。只不过沙漠的诗篇从不保存,它写下后立即就抹去自己的手稿。这只是我踽踽独行时的想法。沙漠不可能想这么多。是我在代替沙漠思想。肯定有滚烫的沙粒渗进我的鞋子了,硌得我的灵魂很疼。我尽可以把自己当作沙漠里终于出现的一个敏感的灵魂。而沙漠已习惯了麻木:除了沙子还是沙子,不可能有更多的想法。

估计月亮上的沙漠也是如此。月亮是离我们最远的一片沙漠,寸草不生。月亮与我眼前的毛乌素沙漠的共同之处在于:没有任何梦想。是人类的想象使月亮变得美好了,掩盖了它的原形。我走在毛乌素沙漠就像走在荒凉的月球上,肉体有一种失重的感觉,而灵魂更是像羽毛一样轻飘。毛乌素远远不如月亮那么幸运——甚至连臆造出来的桂花树都没有,我不知还要走多久,才能结识几棵耐旱的胡杨,那是我另一个世界失散的亲人……今天,我是毛乌素的吴刚,荷戟独彷徨。我远离人群,远离城市,也远离农历里约定的春天。沙漠里只有一个单调的季节。

毛乌素,一本翻开的沙之书,我只能圈阅其中有限的几个段落。我只敢在它的边缘浅尝辄止,怕自己稍有不慎也会成为一粒渴死的沙子。

博尔赫斯写过一篇叫《沙之书》的小说,虚构了一部像沙一样无始无终的古老圣书:这本书的页码是无穷尽的,没有首页,也没有末页,“也许是想说明一个无穷大的系列,允许任何数项的出现”……谁能够读完这本无限的书呢?谁有信心承担这样的任务——清点沙子的数目?从数学的意义上来说,沙漠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它是数学的富翁。恐怕只能用天文数字来概括它的财产。况且它还在不断地增值,不断地繁衍。这是一部最危险的读物、致命的读物。

我在毛乌素想到:怎样才能使那些渴死的沙子复活?怎样才能打破它的饥饿与寂寞?我在代替一座沙漠呼唤一场雨。我在代替一座沙漠索取它那被劫掠的黄金,被绑架的春天,以及属于爱情的绿色……

比拯救现实中的沙漠更为迫切的,还是拯救那些面临绝望的心灵,不要让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如果缺乏这种悲悯与同情,则说明你已变得冷漠甚至冷酷。心灵的沙漠化或许不像土地的沙漠化那么明显,但更为可怕。

我是今天早上第一个走过毛乌素沙漠的旅人。我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个。我希望自己走过的,是最后的沙漠。仅只走了几个小时,也许还不到20公里,但对于我来说这却是最漫长的20公里。我充分体会到了但丁在《神曲》里穿越地狱的惶惑,应该算是最神秘、最富有传奇性的沙漠吧?地狱里除了黑暗还是黑暗,就像沙漠里除了沙子还是沙子。

朴、粗砺的身影出现在我们眼中,而且容易受到忽视和轻慢。但我喜欢。这或许与我的出生有关。我的家乡一年四季只生长玉米、土豆、红薯,它们的身上带着劳动的伤痕和农家肥的气味。一粒粮食从田间走到餐桌,它要通过多少汗水的洗礼,而劳动者匍匐的身影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水稻似乎应当算作众多粮食作物中的贵族。它一直那么纤柔,果实白净、饱满、晶莹剔透,仿佛细小的玉粒。那不是众多的人一直追逐它的理由吗?我不得而知。但我同样不喜欢它过分的细腻、素雅,书生气太浓,贵族气太厚。尤其是它择地而生的性格,有些让人感觉娇气十足。它需要足够的水分滋养,喜欢平坦,追逐肥沃,拒绝干旱、高坡和贫瘠。而玉米、土豆、红薯却不是这样。很多时候,它们只能选择高坡、贫瘠、无水土地,把根扎下去,艰难地生长。这是玉米、土豆、红薯的命运。它们同样也向往平地,渴慕水足地肥,但没有选择的权利。

有时候,我这样想:人其实就是一种植物,水稻,玉米,红薯,土豆,或者别的什么。其实大家当初的命运都相差无几,共同处在种子的起跑线上。但是,却被冥冥中的一阵风或一双手撒向了不同方向。到了后来,彼此的境遇就有了不同,就在成长之后忘记了童年的时光。一棵树长大之后,总是高高在上,它的眼里只有无限的天空和太阳的光芒。它忽视了自己的出生和生命的弯曲。

现实中,我见惯了藐视,见惯了大树似的轻慢和狂妄。他们缺乏对匍匐者的关照和悲悯情怀。他们的骨子里流着清高者的血液,潜伏着藐视的因子。民工的工资可以无限期地拖欠,对衣衫褴褛者任意施以无情的谩骂,对伤残老弱者的躲避和漠视……一个道德和良知、道义缺席的现场,我不知道,面对被遮蔽的天空,一株匍匐的矮小植物,它的仰望能不能够按期抵达。

如果文学是安放灵魂生病的床架,是对病痛的拯救和疗伤,除了美学,它还有更多的责任担当,那我们就应当拒绝“匍匐”生存的一切。